

DOI:10.13318/j.cnki.msyz.2017.03.009

杨筠: 从北京到延安 从延安到北京

秦建平 采访/整理

访谈时间: 2013年6月

2013年,我们在组织拍摄《走向百年——纪念中央美术学院建校95年》专题片的同时,着手启动了抢救性拍摄老艺术家、老学者等中央美院百年历史发展见证者口述历史的工作。谨以此礼敬在这所中国最高等美术学院发展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贤者,也希望为学校百年校史梳理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杨筠,曾用名杨赞,1919年5月17日生于山东省德州市。1935年考入北平艺术职业学校,1936年转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到延安,进入“鲁艺”美术系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晋东南《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成为“鲁艺”木刻工作团团员;同年1月与罗工柳结婚。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新正县三乡任乡文书,后兼乡党支部书记。1945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北方大学文艺学院、华北大学三部工作。

1949年回到北平,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科长。1952年调中央美术学院,历任人事科科长、政治教研组副组长、陈列馆副馆长。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3年离休。

三个北京姑娘去杭州

我16岁那年考到北平艺术职业学校学习绘画,当时班里有两个比较要好的同学,黄薇和张晓非,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姑娘想从旧的封建家庭逃离出来,学点本领,养活自己,不靠别人,想法很简单。学画画主要是将来可以当个小学或者中学的美术老师,那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参加过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脑子里大致知道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产党。很快华北时局变了,北京也不安全了,当时学校有个杭州艺专来的叫王肇民的老师,他介绍我们去考杭州艺专的插班生。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决定到杭州去。

去了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考取了二年级的插班生,三个北方姑娘在那个学校里,同志们觉得很开朗,很容易打交道。我们三个人中,黄薇是北京西单商场老板的

女儿,这个同志接触的面很广,那时候接触了一些进步的同学。张晓非是从东北到北平,父亲是在哈尔滨开大车店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但她也要自力更生。我们那一班有五十多个人,那时候女同志很多,女同学有一半,男同学有一半,但是各有各的想法,好像我们三个人的想法都比较接近,就是去学本领,在北京艺专学不成,在艺专学的东西不能去教书。

我们三个人到杭州去考了二年级。为什么考二年级,不从一年级学起呢,就是说要争取时间,我们学两年就可以出来了,当时杭州艺专分预科和本科,不去学本科,学本科还要学三年嘛,我们那时候没想到要做画家,要做艺术家,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让自己有点本领,自力更生。

到了杭州,不闻不问,大家关上门学本领,学什么本领呢?就



1940年,罗工柳与杨筠在敌后化装成农民

学画画,很用功地画画,别的都不管,就是这样。到了杭州学了两年以后,整个时局又变了,东北独立了,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

要占华北，要打华北。到暑假的时候，形势就紧张得很。七七事变后，仗打起来了，北平也紧张，上海也紧张，怎么办呢？黄薇和张晓菲就从杭州转到上海美专，要我也去，我不想去，因为她们比我有本事，我不太灵活，不适应上海生活。我说我还是等在杭州毕业吧，就留在了杭州。

在杭州，我认识王朝闻，他比我高两班，是四川人，他去浙南画壁画，就约上我，我就跟他去了。王朝闻打轮廓，我填颜色，红裤子、蓝袄、绿裤子、小孩，画了快两个月。后来杭州形势也紧张了，王朝闻说，你回学校吧，咱们也要散了，就是那批画画的人要散了。那批画画的人是杭州的，也不是我们学校的。后来我就回学校了。学校那时候就开始逃难了，我就跟学校一路逃到湖南。到了湖南，我没饭吃，因为我的家是山东德州的，我的母亲在德州，她虽然有点地租，“七七”事变爆发后，家里粮食、钱都寄不来了。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认识了毕业班的卢鸿基。卢鸿基有个孩子，两岁半，他把孩子接到了长沙，找我帮忙带，我说可以。为什么找到我？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比较开朗，那些大小姐们人家不找。我其实不会带孩子，我是家里最小的，上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就依靠着王文秋，王文秋是我的同学，逃难的时候我俩就遇到一起了。她的父亲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小学的校长，赞成她出来。我就跟王文秋两个人帮他带孩子，沿着沅江一直往上走，后来我们一起把孩子带到了沅陵。这时候卢鸿基把孩子送到了湘西一个同学的家寄养。

延安来信

我到沅陵以后，就接到黄薇和张晓菲的信，她们是从延安到学校的。信上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延

安，你也来吧，这里第一有饭吃，第二有学上。我既没有学上，又没有饭吃，就赶快走吧！我也知道到延安去有饭吃，有学上，我也想到延安去，可是我没有钱，怎么走呢？

我依靠我的大姐姐，我大姐姐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家了，她的爱人在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当教员，她有钱，曾经给了我25块钱，我从武汉一路到沅陵。但是我到沅陵交了8块钱的饭钱，买了一双鞋，我又一个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我就跟王文秋同志商量。王文秋的父亲是个小学校长，留给她一点钱逃难。那时候碰巧有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她的家里人就介绍她认识，就是要他们好。那个男同志寄了100块钱给他，我说我一个钱没有怎么办，王文秋说我给你13块钱。她给了我13块钱，我想到长沙找到我的大姐姐，再向我大姐姐借20块钱，我就可以到西安，从西安走路可以走到延安。当我走到我大姐姐那，她说，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小孩子还要请奶妈吃奶，还有个婆婆，她没有钱。她说，我有戒指，有十几个呢。我姐姐就给我一个要我去卖，我说我不卖。我回去又跟着卢鸿基。那时候罗工柳跟着卢鸿基，罗工柳是个小孩，那时候好像我比他高一班，他不会普通话，讲家乡话广东话，他好像什么都木得很，笨得很，一直跟卢鸿基在一起。

卢鸿基是广东人，他们是老乡，这样子。我们在武汉就碰到我们原来杭州艺专“一八艺社”的同志们，就说你们在这里组织木刻协会，组织全国的。那时候罗工柳已经刻木刻，我那时候还在学画画，没有刻木刻。后来的时候我也喜欢木刻，因为我在杭州也接触了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在刻木刻，我也开始学木刻。我又开始跟卢鸿基、罗工柳在武汉学木刻。因为我

姐姐没有钱，我在那儿等。王文秋借给我的13块钱又给卢鸿基和罗工柳留下做伙食费，还是搞不到钱走。卢鸿基同志说，你不用着急，等着我们发了工资，把钱给你，你就走。我说好吧，反正他两个人，他跟罗工柳在那工作。我就等了差不多有十来天，就准备着到延安去。

我原来杭州那个班里的一个同学叫吴藏石，也是一起画壁画的，他已经结婚了，把爱人也带到杭州了，他家是华侨，他有钱。杭州被占领了，他就要带夫人回广东。他整理了一下还有70块钱，就留给班长闵希文，说给你们留下可以吃饭。我们这几个同学也就有了一些吃饭的钱，离开杭州的时候，我没有带走钱。这时候那个班长就寄给我30块钱，还说你赶快回来，再有两个月可以拿到我们预科的文凭，拿到文凭有好处。

我拿到了班长寄来的这30块钱，我就可以走了，到延安去了。这30块钱拿到手里，我留下10块钱给卢鸿基他们在武汉吃饭，拿着20块钱从武汉到河南，从河南到西安。

到延安去

那时候形势很紧张，我们就跟着抗日救国会的一个大姐姐，她说走吧走吧，我带你走，她把我带到河南。她是抗战第一军冯玉祥他们部队的，是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她没有说她在哪儿工作。她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就住在一个老乡家，有爷爷奶奶，有个大哥哥在铁路上工作。那个大哥哥说，我送你上车，从河南去西安。我们这时候一起走的有三个人，一个高小毕业的，还有一个搞会计的同志，我们三个人都是女孩子，就跟他一道走。

他就带我们三个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之后，他给我一个人的名字，说你打电话找这个人来。这个

人是西安搞地下工作的人，我打电话说我来了，这个同志就来了。他说，好啊，你俩到青训班去，青训班开始了，你不是学画的吗，到七贤庄去吧，我们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他就把我带到七贤庄。我到了七贤庄，说我是杭州艺专的，其实我也没有证件什么的，那时候也没拿到手。他说好啊，考一下，画一个男人体，画一个宣传画，写一篇你为什么学美术，你为什么学画。我就用了大概三个小时，画了一张男人体，画了一张宣传画稿。那时候画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了，我又写了画画对宣传抗日有什么好处，我去画壁画的时候，老乡们是怎么样怎么样喜欢。他们看了这个，好，你下次走吧，有车，得交十块零五毛钱的车费。

我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只有20块钱，已经花了，我就把我一个小皮箱，我祖祖辈辈的照片在里边，还有什么呢，我杭州的校服，还有我爷爷给我一块表我戴着。于是我就把我那个箱子去当了，为什么当呢？因为张晓非她们来信，带着一个当票，是西安当铺的，他们的一个同志一路走到延安去的时候，走到那没路费了，把三条裤子一个褂子当了4块钱，他们已经到延安去了，要我想办法给赎出来。我用4块钱赎出来，就没办法了，我就拿我的小皮箱去当。去当的时候，人家说给你5块钱，我说我不要，我要4块钱，我三个月以后来赎。因为当时说，在延安学三个月以后就出来，或者到敌后方，或者出来抗战，我说到那时候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照片、我祖辈三代的照片，我的东西，我要当出来。

我从杭州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毯子，一个被子，把那个小提箱当了，我这时候只剩了一个毯子、一个被子、一个当票。为什么当呢？不当的话，我从西安就走不到延安。我当了这些钱之后就可以坐车。我从西安坐上八路军的车，坐了三天就到了。

考上鲁艺

我到了延安以后，我说我是画画的，就又考试，画一个素描。这个对我比较容易，一个上午就行了。这时候我碰到了胡一川同志。头一年暑假，胡一川在苏州反省院放出来，首先到了杭州，他到杭州看看以前“一八艺社”的同志们，只找到了过去跟他们在一起的卢鸿基，他来的那天，我和同学恰好在西湖边，记得是在白堤的第一个桥碰到他。卢鸿基就把胡一川介绍给了我。当时我还有一个同学叫王启晨，我们两个人到白堤去凉快凉快，就碰到了他们。

我记得在杭州的时候胡一川告诉我他要出国，他要去怎么怎么样，我就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说，我来办事了。我也不懂得人家办什么事，就是这



罗工柳与杨筠在延安

样。人家说你答卷子，答卷子，我就急急忙忙的，大概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这时候就听到张晓非喊：杨筠来了，杨筠来了，你看她的衣服。我那时候画油画，有一个画服，就挂在那个门口那个门上，因为我俩画油画的画服是一起做的，她就认出来了。我这时候把卷子拿起来交了，我想他们要我也好，不要我也行，反正高兴得很。碰到张晓非和黄薇，我的目的达到了。

他们告诉我，假如鲁艺不要你的话，你可以上抗大，也可以到陕公，那是陕公最后一班。后来的时候，鲁艺当时的领导沙可夫同志看我把卷子交了，说：好，等研究研究。我就等他们研究研究。第一天研究了，没消息，我也不管它，我反正跟着大家去吃饭、去玩、去做什么，去延河边洗澡，什么都不管。第二天还不通知我，到第三天，我说我去取东西了，因为张晓非有一捆信，我进延安的时候，检查的人员说要看一下这些信，我就给了他。到第三天我就取信去的时候，碰见沙可夫同志，他说你到哪儿去啊？我说我到南城去取信去。他说给她个校徽戴上。我说，你看我已经戴上了啊。就是鲁艺的第一个校徽，一个像，鲁迅的像，没有说要我，我就已经戴上校徽了。就这样，我取回来交了，没事了。

记得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张晓非、杨角我们这些北京的同学跟我在一起，就告诉我什么叫统一战线，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国民党，教我做好准备回答问题。我正在那学着，沙可夫同志在北门外向我招手：杨筠，你来。他问我，你到底是哪儿人呢，我说我是北方人，我不是杭州人。你小米干饭吃得饱吗？我说我习惯了，我从小都吃小米干饭的。他说，好好好，给你办好了，你就在这里。我就这样办好了，就入了鲁艺。

那时候鲁艺的第一期同学还没有走，第一期美术系只有十几个人。那些同志们过去也没学过画，都是冀中来的，第一期。我那时候已经到了5月份，3月底把他们送走，4月、5月大批的人来。到了6月份，我们美术系已经有90个人了，这时候像罗工柳也到了，彦涵也到了，我们是同班的。我说彦涵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找共产党。因为他是个穷人，他家里很穷，父亲没工作，后来他学了画，跟我同班，比我大好几岁。后来，杭州艺专也来了好多同志。

还有一批人，是过去徐悲鸿所在学校中央大学的，像冯法祀，还有夏林。这90个人中，一部分是杭州的，一部分是北平艺专的，还有一部分是各地来的。我们这时候的学习，主要画素描，学习政治。当然主要还是学政治。这个政治讲什么呢？主要是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国民党要怎么怎么做，共产党要怎么怎么的，什么是马列主义。我们一天到晚高兴得很，就那样一起学习。

到了10月份，大家都申请入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家都很高兴。作为共产党员多好，可不能当国民党党员，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党员很不好，接触得很少，反正就这样一个印象。

到前方去

到了10月底11月初，延安第一次遭到日本人轰炸的时候，我们这批人都在延安。这时候就又要走了，到前线去，或者到地方去。

那时候洗澡男女共用一个澡堂子。那个洗澡堂子在东门外，我们女同志在6点钟以前进去洗澡，到7点钟，女同志出来，男同志再进去洗澡。那时候已经到了10月底了，大家洗澡很不容易。我洗完澡去晾衣服，衣服晾在我们那个鲁艺的山坡上。这时候沙可夫同志从他窑洞

走出来，哎，杨筠，你们现在怎么办呢？这时候三个月学习完了，有人要上前方，有人去地方，有人去学政治。他就问我，你到党训班去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入了党了。因为那时候入党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我并且告诉沙可夫同志我已经入了党，我可以到党训班去学习。他说，好好好。

当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张晓非说要到前方去。我们还有一些老同学，像杨角她们，大家都要去，就拉我一起：走吧，到前方去，不要留在延安。我也这样想。罗工柳就特别找到我讲，我们走吧，走吧。因为他跟卢鸿基关系很好，后来我们在武汉不是一起呆了十几天嘛，罗工柳老向我讲，要革命、要革命、要革命。我当时说，革命嘛，自己去革嘛。后来的时候，他知道我准备到党训班去，就不希望我去，他希望我到前方去。我自己也希望到前方去，到打仗的地方去多好啊。他说走走走，咱们走，他拉我走。我去找李伯钊同志，李伯钊同志原来是我们鲁艺的老师，教我们跳俄罗斯土风舞的。那时候女同志都在学。后来的时候，李伯钊同志就跟杨尚昆同志讲，这个女同志也要到前方去，他说好啊，赞成赞成。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发了行军的鞋袜费，每个人两块钱，我也有鞋袜费，就这样，我就到前方去了。

从延安出来，走了一个月，一直走到晋东南。

那时候胡一川同志就组织好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他组织了四个同志，他开始不要女同志，嫌女同志麻烦。那时候是战争年代，不想带女同志，他就要了三个人，一个是罗工柳，一个是华山，一个是彦涵，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人。这样子大家一路上走，一路上走，一路上走。

又走了有一个多月，差不多到

年底了。

跟罗工柳结婚

我们就在北方局过年，等分配。跟我们一道从延安出发的那些人都分配了，有的到部队艺校去，有的到什么机关去，有的到地方上去。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在那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愿意到艺校去，到艺校要当老师教画画。我素描虽然学了，没有张晓非好，也没有杨角好，我去教书有困难。后来通知我说到报馆去工作，到报馆去工作很有意思，我想去。罗工柳也到报馆去，因为他是木刻工作团的，我不是木刻工作团的，后来说还有一批人，文学系的人，做记者的，我们一共有十个人到报馆去，就从北方局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新华日报》搞插图，搞木刻，我从此就开始学木刻。

罗工柳也分配在那里，这样两个人分配在一起，也比较熟悉。后来住在一起，房子好安排。我们报馆的领导同志说，你俩就住在这里，你们结婚吧，结婚吧。既不登记，也不去做什么，小八路就这样结婚。结婚吧！我们就结了婚，就从此住在一起。一直住到他88岁，分手，就完了（按：罗工柳先生于2004年10月去世，享年88岁）。

这时候我们从延安走出来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在那里干了一年，忙得很，因为搞社论插图，搞通讯搞插图，基本都在晚上搞，画版、刻、印，然后送去出版，就是这样。

搞了一年后，胡一川他们那个木刻工作团就都来了，华山也来了，彦涵也来了。华山因为原来不是画画的，他搞木刻很有意思，但他眼睛不好，搞起来很吃力，后来他就去做记者，写文章去了。彦涵就在区党委找到个女同志，他觉得到报馆工作不好，于是他就跟女同志到学校去了。那个女同志是绥德

人，现在还健在（指彦涵夫人白炎）。他们也结了婚，在那成了家，就这样。

我们后来就到了冀南，碰到了王任重同志，动员我们去搞木刻训练班，我们去干了一年，说是一年，实际上是春天去秋天回来，搞了个班，一方面教同志们刻木刻，一方面要教同志们画速写，画素描。胡一川调回延安，我们这几个人，我一个，还有邹雅，还有一个同志，在报馆工作了差不多十个月以后，敌人扫荡得厉害，我们就跟赵树理准备要搞一个《中国人报》。搞《中国人报》是在下边，在群众中搞，不在报馆搞。

到了1941年底，北方局就叫罗工柳去开会，他开会回来说延安有个通知，调罗工柳、杨筠回去。快过年了，组织上说给你们一匹马，因为我是女同志，组织上照顾。那时候我在打摆子，一天打一次，一天打一次，已经打了半年，人瘦得不得了。组织上给一匹马，还给一个人帮忙。我跟罗工柳商量，就把那个小鬼带走吧，小鬼14岁，印画印得很好。我们就带着这个小鬼拉着一匹马一起走。从太行山就这样走走走走，走了一个多月，回到了延安。

这个小鬼很聪明，把他带到延安以后，后来就跟我们搞合作社，卖东西供给大家，他记账记得很好。后来就送他到学校去上学。我们回到北京以后，他一直在市委工作，现在他已经也90岁了。

我们就这样在延安又待了三年，搞整风、大生产运动。整风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些学生没什么好整的，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到前方，没犯什么错误，工作很顺利。我们的木刻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特别是我们搞了一个年画，搞了八大张年画，搞出来以后，贴到了我们那个房子的后面，老百姓都很喜欢。所有机关用，家家户户都用，

哪里都有。后来彭德怀还给我们写了封信，说这个很深入群众，好，就要这样子搞。

我纺线罗工柳开荒

那时候毛泽东讲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我们是大鲁艺的，没出去的人是鲁艺的，就是这样想吧。后来大生产运动，我就去纺线，罗工柳开荒种地。

我们一回到延安，就先到了桥儿沟，鲁艺原来在北门外，后来搬到了桥儿沟。我说休息一下再走吧，就跑到鲁艺那个西山去。我一走到那里，看到了王朝闻就叫了一声“王兄”。他说，哎！他们回来了！这时候只有我跟罗工柳，还有那个小鬼。他说，你们上来上来，吃了饭再说吧。因为我们还有要到杨家岭的中组部去报到。因为中组部调的，要去报到。

走了好远，回来了，累得很，就先住在那。一进门，江丰就跟我们搬了个铺板，搭上铺板，你们就睡在这儿吧。就这样我们又回到延安。

我们到中组部报到转关系，就把我们转到了鲁艺。那时候鲁艺一部分人，还有文抗一部分人，那时候艾青、萧军他们都在文抗。我们就又回到了鲁艺，这时候鲁艺的美术部不叫美术系了，江丰在那儿做部长。胡一川也回去了，他到处宣传我们在前方怎么做怎么做，现在后方的人也在学习我们前方怎么做。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三年在前方做了些什么。

三年过去了，我就又走了，到了大关中去做乡文书。我在新正县三乡做了乡文书，觉得很好，过去没有那么深入地下乡。一个乡长、一个支部书记，作为乡文书了什么事儿都要你管。这一段对我的教育很大，对罗工柳的思想影响也很大。我们那时候要做画家，要成为什么什么人。后来觉得经过这样工

作之后，原来那个想法不应该，应该是深入群众，为群众做事，这个思想转过来了。

在大关中呆了两年多吧，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好啊，哪来的哪去，我们都是外来干部，不是本地的，外边来的干部要回到原来地方去。我说好，我回北平，罗工柳说他要回广州，他没来过北平。我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吧，哈哈。

回到中央美术学院

后来我们去了华大三部，三部是文艺部，戏剧、音乐、美术，还有文学。到了华大三部学校就派我去搞教务，我就离开了美术部。管了一年半，后来要成立美术学院，我说我不去美术学院，我不去教书，我要搞我的木刻，我要下工厂，我留在华大，后来就去搞那个华大的普通班。

后来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罗工柳他们那一批就特别着急想画画。罗工柳很快创作了两张画出来，就因为这两张画，学校就把他送到苏联进修去了。他去苏联进修了，我有个儿子，安安，就是现在的罗安。学校说罗工柳走了，你到这来吧，把你这个儿子管起来吧。这时候我跟胡一川都住在这里，住了半年以后，江丰调回来了，从杭州的华东分院调回来。

我们就这样，又都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秦建平

中央美术学院宣传部部长

100102

（本文责任编辑 初枢昊）